

儒家文化与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

施 健

(厦门大学 经济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试图从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这一新颖的角度出发, 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原因。

关键词: 儒家文化; 正式制度安排; 交易成本;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 120.3¹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01) 03-0046-03

一、儒家文化与正式制度安排

与西方发达国家各民族相比, 中华民族在对待正式制度态度方面的缺陷是显著的,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中华民族不太重视法律和制度的设计, 不太注重依靠外在形式对人进行约束; 而西欧各民族则相反。(2) 在法律和制度形成以后, 中华民族不重视其贯彻机制的建立, 一切正式成文的法律都可以随时因特殊的需要而改写和放弃; 而西欧各民族虽然常常为某一条法规和制度的建立争吵不休, 但一旦形成则严格坚持贯彻。

民族在对待正式制度态度方面的上述特征, 很大部分源于儒家文化的“人论”观, 即“人性”论和“人的本质”论。以下分别加以说

明。

1 “性善论”是造成中华民族不重视法律和制度设计的原因

儒家文化主张的是“性善论”。按照儒家“亚圣”孟子的看法, 人天生就有恻隐、是非、羞恶之心, 以及仁、义、礼、智四种美德, 所以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 “人皆可以为尧舜”, 只是由于后天的生活条件与环境的不同, 有的人善性扩充发挥, 有的则为恶劣环境抑制, 才有人品的参差不齐。后世儒家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思路。自宋代以来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字经》的开头一句就是“人之初, 性本善”, 这大致能说明一般人对人性的实际看法。既然人们相信人性本善, 并且通过后天道德实践的努力, 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 人

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重心就在于“教”，即道德教化。于是，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太重视法律和制度的设计，不太注重依靠外在形式对人进行约束^[1]。

2 儒家文化的“人的本质”论对法律、制度贯彻机制的影响

儒家文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能够知礼义，明廉耻，在家庭血缘关系方面懂得孝悌亲情，在社会政治关系方面懂得忠义，不具有这种伦理道德属性就不是人。孟子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儒学文化过分注重从伦理关系角度去界定人，谈到人，就一定是特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下的人，这就很难把人看成具有同等独立性、平等的人，从而也就很难形成一视同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与此相适应，一切正式成文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因个别的、特殊的需要而改写和放弃，从而使得所谓成文的正式制度事实上也不同程度地等同于非正式的制度^[2]。

中华传统文化在对待正式制度态度方面的上述特征对于解释近代中国市场经济近乎停滞的发展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以下将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加以阐述。

二、正式制度、交易成本与近代市场经济发展

成功的现代化经济交易的最主要的方式是依靠订立契约和有作为第三者的司法系统来强制执行的交易。这种交易方式，即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所提到的非人情化的交易。与之相对的是人情化的交易，即主要靠不成文的商业习惯约束而没有第三者来强制执行的交易。其特点是小量的生产在小地方上交易，在简单的人际关系基础上的重复交往。

人情化和非人情化交易是与不同的分工、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人情化的交易适应于分工和专业

化比较粗糙的经济，市场在这种经济里只扮演调配补充的角色。因为在分工很少、自足为主的经济里，市场的交易量很小，而且占其中很大比例的又是短程的或相互了解、熟悉的人之间的交易。这种交易单凭不成文的商业习惯的约束就能得以进行。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的逐渐深化必然要求扩大市场规模，同时随着较为先进运输手段的出现，使远程交易成为可能。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远程贸易造成交易双方相互之间变得不了解、不熟悉，从而交易的风险跟着提高，单凭不成文的商业习惯约束的人情化的交易已无法降低该风险。因为，在没有商法和商业法庭保障的条件下，违约图利的强烈诱因不能被有效地遏止。习惯风俗对违犯者只能作消极的制裁，很难补救受害者所蒙受的损失。此时，若没有一些有效的方法来降低风险，大家就会取消远程交易和与陌生人进行大宗交易的念头。市场交易仍局限在小范围和小规模的低水平上。市场的发展受到限制，并反馈于生产领域，其结果是：生产的规模不能扩大，即使出现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高超的工艺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技术的创新受到遏制，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由此，我们联想到关于近代中国“技术悖论”的争论，即近代中国，在诸多方面的技术都处于领先地位，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越显老态。一个很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原因是：传统技术的革新和提高由于受市场交易的限制，却无法使技术的发明者获得足够的收益。没有利益的驱动，不仅先进的技术、工艺不能广泛地应用于整个社会，生产力无法发展，而且创新激励的缺乏，使技术、工艺到头来只能在原有的模型上蹒跚而行。

西欧经济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分工的细化、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市场交易的复杂、频繁化是与有契约作保障并且靠作为第三者的司法系统来强制执行的非人情化交易同步而行的。因此，存在一个保护交易得以顺

利进行的制度安排是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诺斯认为：“财产权的建立是近代西欧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财产权具有完整而且可排他性的特点，必须受到社会公约的承认和契约性的政府的保护……它的建立大量方便了财物的使用和转移，也大量降低了非人情化交易的成本。”^[3]而财产权就是保护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安排的最重要的一种形式。

三、儒家文化背景下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早在16世纪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在西欧那样建立和发展呢？以下将对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明清社会进行实证分析，以进一步验证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人论”观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内化性的思维方式 在儒家文化的“性善论”的影响下，明清社会的中国人一直很注重内在的修养，“诚心正意”、“由性及品”、“反求诸己”、“慎独”、“内省笃静”等德性方式皆是这一内化性思维倾向的体现。这种内化性的思维方式运用在交易中，使得中国的商人更重视道德准则，不成文的商业习惯的约束，而不倾向于把规则写下来使其成为成文的法律。当时社会上朗朗上口的商业道德准则——“诚信无欺，市不豫贾”、“贾而好德，货真量足”就大致能说明这种内化性思维的影响力所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做过研究，清代出版的商书“极力强调的是要首先注意对人的关系。这表明了当时的商业活动，左右成功与失败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人的因素’”。可见，内在的修养对降低商业风险几乎不起作用。就政府而言，对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颁行也很不重视。直至清末，我国经济法规的种类构成上仍存在很大缺陷。如专利、契约、商务行为、公债、保险、航海等许多方面的法

规都未曾制定。从已定法规的内容看，大多也比较简略，不够详尽，导致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通过清末的经济法规与民初制定的有关法规稍加对比，即可略知一二。例如，清末的《商人通例》仅有9条，而民初的同一法规却多达73条；清末的《公司律》131条，民初的《公司条例》多至251条；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只有简略的26条，民初1914年颁布的《商会法》则有60条，有关商会的《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也多达61条。

2 家族化的伦理基础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儒家文化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实际上具有很强家庭本位和集体本位倾向，这种“家族主义”观念发展到明清已经是根深蒂固。家族观念给人的印象是财产不属于个人，而是家族共有，所谓“产不出门”。尤其是清代，乡族、家族的势力已发展得十分强大，它有时是一个庞大的血缘家族，有时是血缘和地缘的结合，它不仅决定族众的经济地位，亦决定了族众的其他一切方面，因而，族众对任何财产的占有权都附着于乡族、家族之上，是在乡族、家族庇护基础上的占有权。同时，在“人的本质”论的影响下，“家”与“国”是不可分的，是同构的。在儒家伦理看来，家与国，父权与君权，维系血缘家族的家族制度与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可以相互感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同构性质。于是，与财产为家族共有的观念相对应的就是政治上对财产的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使得财产所有权的内容相当复杂而难以界定，既有来自封建政权的干预，又有来自家族势力的干预。这种财产权运用在交易中，使社会公约和政府的法律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毫无效率可言，从而导致了交易成本的上升，妨碍了市场运作，使明清时代的土地、劳力等要素市场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也就无法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 历代商人不是没努力去减少交易成本, 增加市场交易。16世纪中期曾出现许多指导商业的书籍, 如明代黄汴的《统一路程图记》清代赖盛的《示我周行》陈其的《商贾要览》以及与商业有关的会计知识、簿记制度、算盘图式等等。此外16世纪末以后还兴起了各种工商会馆、公所等等。所有这些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远程交易和大规模交易的交易成本(资讯成本), 但这些资讯成本同与制度安排相联系的交易成本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相应的正式制度作保障, 明清时代的人始终没有办法有效地把交易成本降低到使远程交易和大规模交易可以获得预期净利润的程度。市场交易无法大规模展开, 市场无法不断地发展去反馈分工和专业化, 因此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始终如一, 止步不前。

注释:

① 与儒家文化的“性善论”不同, 西欧基督教文化主张的是“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反了上帝的禁令, 偷吃了禁果, 这是人类犯罪的开端, 从此以后, 作为他们后代的人类也就犯下了“原罪”。这种“原罪”是人类自己无法补偿的, 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类。这实际上也是通过宗教语言, 表达了西方文化中的“性恶”意识。既然每个人都有为恶的可能, 都不能完全信任, 因此人人必须接受各种外在法律规范的约束与调节, 各种法律、合同、契约遂由此而生, 从而形成了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

② 相比而言,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 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 西方文化在承认人的社会整体性的同时力求彰显每个人同等的地位和价值, 把每个人当作具有同样独立性的个体, 因此比

较容易接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 重视法规的贯彻机制的建立。

③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pp36~ 38 143~ 157,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④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民商》,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 《孟子·告子》。
- [2] 樊纲. 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 [M] 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 [3] 张彬村. 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 [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7 (1).
- [4] 曾文涛. 论中国前近代时期私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J] 经济评论, 1999 (3).
- [5] 张星久. 从人的观念看中西政治法律传统的差异 [J] 法商研究, 1999年, (1).
- [6] 王日根. 清代地权转换中的非经济因素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6 (2).
- [7] 张中秋.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121~ 139
- [8] 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 10
- [9]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7~ 35
- [10]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36~ 38 143~ 157
- [11] Hicks John.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18 22 ~ 34

(言 良 编发)